

【闲读随笔】

故土的诗意表达

□刘玉堂

这两年闲暇充裕,起坐舒缓,日子过得自是不错。

不过身为写作者,懒的时候也越来越多。这种懒也开始从创作蔓延至阅读上。

我是专业写小说的人,对散文诗歌类的阅读欲望相对迟钝。这种不想阅读其实不是因为缺乏好书,而是因为缺乏好情绪的书。在当下这个出版空前繁荣的时代,好技术的书太多,好情绪的书却少之又少。这种好情绪应该像舒缓的日子,温暖、和缓、回味无穷。可惜,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好技术”,大把的青春在手,积而勃发的野心,由未来而透支的信心,全世界的从容都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被催发。而被催发之后,却很难看到真正可留存的个体表达。

赵建英的《唯美:1984》恰是这几年来所见为数不多的“好情绪”的书。虽然“1984”这个数字的隐喻和标记已经足够复杂,但在不同人的讲述之下,便有不同的味道和体会。其实就现在一切所能涉及的题

材而言,谁也做不到报告新的事实,无论我们说什么,一定会在某一范围内早已为他人所知。70年代人讲述80年代的岁月,那些往事并不新鲜,但当作者以一己的感受倾吐出来,字里行间的土地、庄稼、乡亲、河流就都是新的面目,只是要留心体会那字里行间的情绪才行。

赵建英的这本《唯美:1984》其实可以大概称为作者对故土的诗意表达。这种表达的文字味道有些类似日本的某些散文家,一些篇章隐约还能让人嗅到德富芦花的淡然味道。我之所以只说类似,是因为作品本身还是更偏重于本土化,作者笔下的土地乡村图景,其实更像诗经里的《国风》。

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最好的时光,是一个属于过去时态的词组。可人们又通常认为,幸福则是将来时的,甚至是趋向于无穷远的将来。以此来看来,两个词相隔迢迢,永不碰面。也就是说,最好的时光并不是幸福的。这个结论令人沮丧。不过,也许真的没有太多人,愿意用

过去最好的时光来替代我们想象中幸福的未来。所以,我多少能理解赵建英为什么用“唯美”来命题。当我们在感慨过去某段时间是美好时光的时候,其实并不期待它能挣脱时间轴的束缚,来到现在重新发生或者继续发生。正如同我们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知道那其实是残酷的年代。如果那段时光忽然站在眼前,我们大概也会手足无措。那段时光的真实面孔,已不太重要。人们只想在某个阶段,假装还在它的怀里。或者是把它当作一个故事,说给别人听,而那时我们好像还正和它在一起。这种情感,热烈而悲凉。

赵建英勾勒的故土有一种油画的厚重感觉,能使人想起生命的孤寂与感伤,当然也会有发现花朵般的惊喜心情。作为一个写惯小说的人,我可能更喜欢《众生》单元,一片乡村上的几张脸孔,其实已经概全了一个家园里的芸芸众生。所以在书的结尾部分,我们也看到作者的共鸣:一个人就像是一滴水,水洒进水里,就分

不出你是我的。

1984这个特定的年头象征什么我们无法分晓,只能肯定那是一段时光。而时间又总是让我们不停向前走又向后看。它让我们盼望一直走下去,又想永远停留在某个位置。它让我们野心勃勃又心灰意冷。

好在,时间的仁慈之处在于,它把那些被痛苦撕碎的记忆重新拼好,变得完整无缺。唯美的时光是那些被忘掉又渐渐记起来的时光,它是画面,是影像,是一抹经年的旧时月光安静地照耀。

最后,让我想想我能记起1984年里的图景。那一年是我的本命年,但日子顺风顺水。那会儿,我儿子八岁,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就往县城边上的河堤跑。傍晚时分,河堤两岸都被晒成金黄色。然后我和编辑部的几个小伙子会带着他去水库里摸螃蟹。忙活半夜,捉两大水桶。回来的路上,有一个小伙子偷了人家地里的两穗带着红缨的苞米。那时夏夜空气里的味道,我差一点就能想起来了……

【诗意盎然】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阿布

《雕虫纪历》(1930—1938),一本泛黄的薄薄的小册子,陪伴我二十余年了。它是诗人卞之琳(1910—2000)的自选集,1979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是上大学时在旧书摊上买的,原价三毛八分钱,而作为穷学生的我掏的仅是一个零头——八分钱。

我依然记得当时看这本书时的最初感觉,像是触摸到了淡雾中的一抹嫩绿,心头中怦然一动,酥酥酥的,悠长,又觉得不知所云。总之,这种异样的感觉是年少的我以前所未有过的。

卞之琳经历颇丰,命运多舛。1929年,这个江苏海门的乡下孩子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第二年秋冬开始写诗。此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得赏识,并受到写了《死水》以后的师辈闻一多本人的熏陶,与同窗李广田、何其芳交往密切。毕业后,他教书译文。1938年,到了延安和太行山,曾在鲁艺任教。1940年,执教西南联大,1947年,赴津大学做研究员,1949年,与戴望舒一同回国。上个世纪50年代,他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但遭到不公正批评,直到1958年终止写诗,专注于翻译与研究。“文革”期间,属于“陪斩”之列。

卞之琳不是一位多产的诗人,诗的篇幅也都不长,大都是短诗,有的不过寥寥数语。正如在《自序》中所说的那样,他总在不能自己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诗的规格本来不大,偏

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结果当然只能出产一些小玩意儿。但是,这些小玩意儿的产生,对于制造者来讲,可谓冷暖自知,甘苦自明。在《自序》的最后,他深情地说,把自己的诗交付给读者,交付给时间,像交付给大海。

1935年,应同窗好友李广田之约,到济南省立高级中学执教一年,1936年暑假,辞去济南省立高中的教职,回到北京。当时的省立高中位于杆石桥西头路北,与“省立一中”相邻,而李广田执教于一中。正是在济南期间,1935年10月,卞之琳发表了《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短短的四句诗,引发了持续近八十年的关注与争议,朱自清、朱光潜、李健吾等参与其中,甚至出现作者以为然而读者不以为然的局面。卞之琳自称,《断章》只是一首诗的一段,只是当时的一种心情,没想表现什么,人们注意它,也只是以一种意会。

我以为,《断章》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在喜悦里还包含惆怅与无可奈何的命定感,是卞之琳写给自己终生的刻骨铭心的恋人张充和的言情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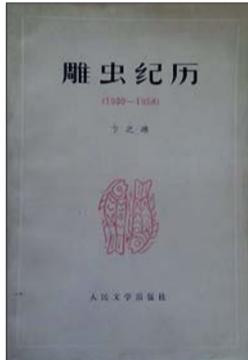
《寂寞》是卞之琳的另一首代表作。“乡下小孩子怕寂寞,枕头边养一只蝈蝈;长大了在城里操劳,他买了一个夜明表。小时候他常常羡慕,墓草做蝈蝈的家园;如今他死了三小时,夜明表还不曾休止。”年轻时,对这首诗我常常茫然不解。而今,我有些懂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慢慢地读懂了诗人的心。我诧异,在当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何能有这么沧桑的心?为何能够对生命与死亡,对时间与空间、对瞬息与永恒、对人生的甘美与悲苦有如此真切的感觉?

二十多年了,就像永远忘不了自己的青春一样,我永远忘不了当年读卞之琳先生的诗的最初的感觉,相反,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一切越来越清晰了起来,就如同一盏愈拨愈明的烛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投稿信箱:qlbook@163.com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阿丹

《价格游戏》

[英]利·考德威尔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星巴克在中国卖的咖啡到底贵不贵?央视批得对不对?

作为世界行为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者之一,英国顶尖价格咨询商 Inon 公司的创办者利·考德威尔的这本《价格游戏》告诉你,定价绝非“成本加利润”这么简单,成本只能告诉你最低售价,但这并非合适的售价。商品的市场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顾客愿意为该产品付出多少金钱。你的价格必须根据你向消费者提供的价值而非你付出的成本来制定。

《在星巴克要买大杯咖啡》

[日]吉本佳生 著
中信出版社

星巴克的咖啡有大小杯之分,买哪种杯子的咖啡最

划算?从经济学视角审视此前人们一直认为“想当然”的社会结构,会有许多意外发现。

日本经济学家吉本佳生在写本书时,曾经前往世界各地调查星巴克、麦当劳等全球餐饮业连锁店,追踪其中的价格秘密。读完本书就会明白:为什么买大杯星巴克咖啡比较划算,为什么便宜不一定省钱。《在星巴克要买大杯咖啡》从头至尾都贯穿着一个核心概念:交易成本。在价格构成中,占比最高的往往不是商品或服务本身的价值,而是无所不在的交易成本。从物流、人力成本到租金,从消费者的时间成本、信息成本到交通成本,都属于交易成本。

《红圈》

[美]布兰登·韦伯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们可能永远用不上狙



击步枪,永远不会变成特攻队成员,永远不会穿上军队制服,但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不光是军迷,更值得那些为“男孩危机”担忧的小男孩的母亲买来给自己的儿子一读。

这是本由美国海豹突击队前狙击手总教练、曾被派



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执行任务的老兵写的书,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无论你做什么,你都需要选定立场,永不言弃。追求卓越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如何让自己的承诺能经受住时间考验。

(本文作者为经济新闻中心编辑)

【好看小说】

感谢罗雅

□毕四军

对许多人来说,若不是卡勒德·胡塞尼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以及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们对阿富汗的了解,总是与战乱、暴力、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这也难怪,9·11事件之后,反恐语境下,世界各类媒体每每提及该国,多半是此类麻烦事。

美籍阿富汗作家胡塞尼改变了这个局面。2003年6月,《追》正式出版,并在数年内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一时间,好评如潮,风靡全球。阅读或观看主人公阿米尔由懦弱少年到男子汉的成长故事,人们百感交集地发现,阿富汗并非遍地恐怖分子和炸弹。那片土地上,同样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阿富汗人也同样珍惜爱情和友谊,

懂得宽容与救赎。当人们向该国投去重新认识的目光时,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和无家可归的儿童。于是,很多人向难民捐款捐物,还有人要收养阿富汗孤儿,这其中包括一些美国人。人性的光辉,在那一刻超越了种族仇恨,超越了国界线。胡塞尼本人也因此于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颁奖官员说,“他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唤醒了无数人对世界难民的责任感”。

十二年反恐战争,阿富汗饱受战火蹂躏,美国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双方没有赢家,文学却赢得了尊重。2013年,随着美军逐步撤离,更多被《追》唤醒的人走进了阿富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感



谢作家,感谢文学,或许还要感谢胡塞尼的妻子:罗雅。

胡塞尼的写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作品仅限于家人阅读,

之后便束之高阁。9·11恐怖袭击时,书稿尚未完成,不久,罗雅就建议丈夫向出版社投稿。胡塞尼觉得此时的美国伤口未愈,民愤极大,“没有人会听一个阿富汗人诉说”。罗雅却认为,此时正是向全世界讲述阿富汗故事的大好时机。她说,“到处都是对阿富汗人的偏见和误解,你的书能让他们看到阿富汗人的另一面”。妻子的话有道理,但胡塞尼仍旧犹豫不决,事实上,他更希望像以往那样——将书稿搁在储藏室。然而,罗雅最终说服了丈夫,她的一句看似朴素却意味深长的话,促使胡塞尼将书稿投了出去。

她说:他们妖魔化,你可以人性化。